

法国的国家干预经济经验及对我国的启示

张亦珂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 上海 201204)

摘要: 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 不仅是我国三十多年改革开放以来必须直面的“新”问题, 也是发达国家曾经深入思辨过的“旧”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法国政界与学界曾多角度广泛探讨政府调控经济的功能、效率与效应, 形成了法兰西视野中的经济规划理论与模式。本文透过法国 1946 年至 2006 年的 11 部国家经济规划方案出台的历史背景与要义, 梳理出法国国家干预经济思想与理论发生、发展、兴盛、衰落四个阶段, 试图总结出值得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借鉴的经验与启示。

关键词: 政府和市场关系; 法国经济; 国家干预理论; 经济规划方案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并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切中当前改革之肯綮。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法国政府与市场之间的良性动态关系, 对法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起到过积极促进作用。法国的国家干预主义曾助力法国“光辉三十年”的经济腾飞, 而后政府调控又逐步让位市场机制, 淡出国家经济活动。本文就法国 1946 年至 2006 年的 11 部国家经济规划方案出台的历史背景与要义, 根据相关事实资料剥茧抽丝, 梳理出法国国家干预经济发生、发展、兴盛、衰落四个阶段。本文认为, 探索独具特色的中国政府与市场关系应当紧密围绕改革开放的根本目的, 从本国历史文化传统出发, 注重改革顶层设计, 不但要考虑国内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 还要应对国际上复杂的形势和挑战, 才能更好地规避全球化的风险。

一、法国国家干预经济的历史溯源

法国国家干预经济的思想与实践在封建专制时期就已存在。路易十四时期的财政大臣柯贝尔主张国家应在经济事务中起重要作用。他善于运用法律和政治手段鼓励私营企业活动。他认为应该有目的地选择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优势行业, 动用举国之力创办或培育某些大型项目, 使它们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支柱企

业。柯尔贝尔主义深远影响了法国现当代经济思想。

拿破仑时期的政府也偏好运用行政手段来发展工商业。政府对经济采取集中管理的方式, 一方面推行关税保护政策, 提高进口税率, 阻止外国工业品进入法国市场; 另一方面对本国工商企业给予帮助, 如拨款补助与国家采购等。此外, 政府还专门设立了管理机构, 其中起了较大作用的有法兰西银行、工业和商业部等, 为经济快速发展创造了条件。拿破仑三世加强了政府调控经济的职能, 其目的在于促使经济自由发展, 而非横加限制。他说: “国家不是一块应于割去的溃疡”, 而是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主角, “强大的国家成了伟大资本主义的靠山”^①。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 三十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催生了欧洲的经济规划主义思想 (planisme), 代表理论家之一是比利时人亨利·德·曼。他认为, 国家对经济进行发展规划的行动能够深刻改变社会, 至少可以避免市场机制的负效应。这一思想极大影响了左翼社会主义者与工会组织主义分子, 也为后来戴高乐领导的法国抵抗运动组织所接受。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 法国的资本主义社会经济仍是碎裂化的, 缺乏具备竞争实力的大型企业。分散的小企业通常为家族持有, 与德国和美国的规模化企业相比, 缺乏活力与效率。当时的决策者们认为, 为了使工农业中陈旧的生

作者简介: 张亦珂 (1980 -), 女, 上海人, 法国巴黎第四大学政治学博士, 现就职中国浦东干部学院教学研究部, 研究方向为地缘政治学与比较政治经济学。

① 阿兰·普莱西 (Alain Plessis), 《从帝国节日到公社社员墙 1852 - 1871》(De la Fête impériale au Mur des Communards 1852 - 1871), 巴黎 1979 年版, 第 88 - 89 页。引自: 张丽, 《战后法国“政府调控经济论”的主要内容及其成因》, 世界历史, 2003 年第 4 期, 第 56 页。

产设备与落后的经营方式得以改造，必须借助国家力量推动产业进步，古典式的自由放任只能加剧社会经济的混乱。从历史上看，法国确实也有执行这种经济政策的土壤。

二、二战后法国国家干预经济理论的雏形与发展(1946-1961)

1946年，戴高乐将军牵头成立了法国计划总署。该机构直接向政府首脑汇报，主要职能是制定中长期经济规划方案，预测和协调经济发展。从1946年到1961年，法国一共出台了三部经济规划方案，标志了法国政府调控经济理论的雏形与逐步发展。

第一部规划方案（又称莫内方案）从1946年延续至1952年，与马歇尔计划同步结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经济恢复并重建的代表性规划方案之一。当时，法兰西面临“现代化还是衰落”的困境，存在各种争论：究竟是回归经济马尔萨斯主义，还是促进公正理性的政府建设；究竟是重塑平等的社会传统，还是刺激资本主义经济增长。但很快国家干预主义（dirigisme）及国家经济发展唯意志论（volontarisme）占了上风^②。当然，政府干预经济理论还只是一种思想观念，尚未形成理论体系。

自1945年12月至1952年，让·莫内（Jean Monnet）担任重建计划方案专员，在经济重建中起了关键作用。战后最初的政治基础是众多党派的求同存异，这些党派均源于抵抗运动，显然无法适应长期的经济建设。莫内擅长通过社会各界间的持续谈判来寻求共识，一方面规避形式主义与利益游说主义，另一方面采用实事求是、精诚团结的工作方法，最终在1947年推出了重建方案，获得企业主、工会与政府的多方认同，平息了社会争论。方案使得社会大多数人赞成政府应成为经济与社会生活的行动者，通过国家权力逐步恢复政府的经济职能，保证社会各种力量的合作，从而促成了战后的发展规划方案与经济协调发展。

莫内认为战争经济是计划经济，因此战后重建经济也应延续计划经济，但绝不采用苏联式的计划经济逻辑。他认识到法国经济不仅要恢复到战前的水平，还要有持续的增长，因此关键是进行改革，“要使人们懂得主要的困难在于我们设备的陈旧与生产方式的落后^③”。而进行这种变革需要政府的作用，因为传统的经济学理论信奉的市场自动调节机制不能导致宏

观经济的最大平衡。他的重建方案不是通过制定纸上谈兵的经济发展目标来恢复经济，而是想方设法刺激经济活力：一方面，国家积极投资大型基础设施项目，选择有国际竞争潜力的重点企业进行专门培植；另一方面，采用灵活有效的行政指导制度，力求避免有害经济运行的官僚作风和行政体制弊病，保证私营部门平等参与竞争。因此，莫内的方案具有“创新的二重性”，代表了法国式“协调经济”发展构想。

重建方案实施的第五年，法国经济增长达到了战前最高水平，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重建，基础工业实现现代化。美国向欧洲大量输出生产设备的同时支持生产率提高项目，促使先进的技术知识与管理经验迅速转移到欧洲。1952年至1953年间，法国国民储蓄激增；国家鼓励银行向企业低息贷款；房地产投资与国产设备制造兴盛，居民预期收入增加，拉动内需。莫内的重建方案，特别是大型工业项目的迅猛发展证明：中短期内，在不同于盎格鲁·撒克逊式传统政党政治的制度安排下，只要具备协同、弹性的经济发展机制，政府有能力推动国内经济快速发展。

但是高速增长法国经济并非一帆风顺，主要面临四个问题：一是通胀，二是国民收入没有如预期般增加，三是国有资本量小，四是国家过度保护工业。从法兰西第四共和国的最后一年1954年开始到1957年，法国执行了第二部经济规划方案（又称赫希方案）。在这部方案的指导下，政府继续表达了介入社会经济生活的强烈意愿，加大对教育医疗等公用事业的投资，提高对自然资源与人力资源的利用率，增加人均收入。

第三部方案的实施是从1958年到1961年阿尔及利亚独立。这期间戴高乐当选为法国总统。他巩固政治体制，奏响了国家干预经济高峰的序曲。战后政府调控经济的各种措施初见成效。50年代下半期开始，法国迅速扭转了战后短缺经济，国内市场供需活跃，进入良性循环。经济发展面临许多有利外在条件：美国知识技术的转移，国际市场原材料供应丰富，充足的廉价劳动力，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的稳定运行，欧洲制造业基地规模不断扩大。伴随经济增长，政府鼓励个人消费，建设社会福利体系。这些都为法国上个世纪60年代国家竞争力提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欧洲整体工业发展迅速追赶美国，不仅是欧洲具有传统

^② 艾利·科恩（Élie Cohen），《国家干涉主义，工业政策及工业主义者的巧辩》（Dirigisme, politique industrielle et rhétorique industrialiste），法国政治学刊（Revue française de science politique），1992年第42卷第2期，第211页。

^③ 车耳，《战后法国国家干预经济理论的形成及干预政策的变化》，西欧研究，1985年02期，第2页。

优势的机械设备制造业得以现代化，新兴的化工与电子行业都在迎头赶上。这时候，包括让·莫内在内的欧洲政治家开始推动欧洲一体化进程，再度刺激了法国国内经济的发展与西欧国家的经济活动交流。因此，第三部方案最重大的意义是取消关税壁垒，使法国产品加入欧洲共同市场的竞争，并远见地制定了长达十年（1955-1965）的产业发展方案。

三、法国国家干预经济理论的成熟兴盛期（1962-1970）

从1962年到1975年，法国相继推出第四与第五部经济规划方案。方案的背后有经济学家皮埃尔·马塞（Pierre Massé）的计划市场二元调节理论以及雷蒙·库尔比斯（Raymond Courbis）的受竞争理论作为支撑，显示了法国国家干预理论的成熟。

六十年代初，实行国家干预的思想在当时社会思辨中占上风。但政府调控经济的思想成为系统理论则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才由马塞总结出一种国家计划机制与市场机制二元调节的理论。这种理论试图走出一条介乎于“官僚集权制的硬性计划与野蛮的资本主义完全市场调节之间的第三条道路。”^④马塞认为以指导性计划为特征的国家干预作为“第三条道路”的尝试，不仅为了减少未来的不确定因素，也强调了社会主观愿望。它的作用是在权力与市场限制之外寻求一种经济发展的公共设想。它使公共目标更加明确，使社会公共活动中每个人的行动都有一种伦理价值，因此指导性计划与指令性计划是完全不同的。与苏联式的硬性计划相比，法国式的经济计划认为国家并非一个决定一切权力的中心，承认人自由选择的权利^⑤。在个人与国家之间，存在活跃的社会组织和中介机构，例如行业协会、工会、老板协会等。它们代表了不同的利益集团，承担了制度博弈的功能，是沟通国家与个人诉求的温和渠道。因此，所谓“第三条道路”的思想，意味着既拒绝所谓极权主义，又反对自由放任。

马塞在1965年的代表作《计划抑或反盲目性》（*Le Plan oul'antihazard*）中写道：“市场是短视的。证据就是企业在开展一项交易前，总会做一番市场调研。”他在书中表达了这样的看法：第一是国家应当

运用计划机制与市场机制两种手段共同调节经济。计划对未来的预测越完善，市场机制就能够运行得越有效。计划只会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而不会压制市场机制的作用。这实际上继承了路易十三时期首相黎塞留“理性国家”的政治哲学遗产与柯尔贝尔的政府调控经济论精髓；第二是市场经济可以自动调节个人追求市场竞争的权利和积极性，而政府干预则可以纠正现行不合理的体制。马塞认为，人类的命运是集体的命运和独立的个人命运的组合，个人只有在利益均等中才能获得最大利益。这与戴高乐的看法不谋而合。戴高乐也认为：“国家需要将自然资源、劳动和技术，这些使人富裕的经济资源为普遍的人们的利益服务，而不能只为几个人的利益而发展。”^⑥这充分体现了在追求“效率与公平”过程中，政府干预公共经济政策的伦理价值基础。马塞与戴高乐还认为国家干预经济不仅应该反映在规划的制订上，而且要反映在规划的执行上，“规划所规定的有关国家整体及其每一区域的设想，改善所有社会阶层特别是最贫困阶层生活条件的目标，规定公共与私人投资的范围使增长有节奏地进行，所有这些对于法国人来说都有义不容辞的责任”^⑦。

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从1962年到1964年法国政府执行了第四部经济规划方案。在良好的国际国内发展环境下，法国经济高速增长，表现优异。因此，该方案被视为所有规划中最终输出效应最好的一部，代表了马塞二元调节理论的实践。方案延续了前三部方案的特征，评估相对落后的社会经济环节，提供宏观的国际国内形势预测与分析，提出长期的战略构想和发展目标。方案的实施具有较强灵活性，不要求所有企业遵照执行，但要求政府有针对性地加大投入落后产业，提升了相关行业现代化水平。与之前的几部纲领不同，方案对经济发展做出长期规划的同时，注重社会发展总体平衡，力求极大缩小社会阶层与地区发展的差异。方案中说：“本纲领的主要目标不再是对短缺资源进行配置，而是更关心经济发展成果的公平分配。”

由于第四部纲领执行期间经济成就巨大，到了第

^④ 《法兰西手册》，1977年181期，第6页。引自：车耳，《战后法国国家干预经济理论的形成及干预政策的变化》，《西欧研究》，1985年02期，第5页。

^⑤ 车耳，《战后法国国家干预经济理论的形成及干预政策的变化》，《西欧研究》，1985年02期，第2页。

^⑥ 弗朗索瓦·科谢（Fran, cois Cochet），《1945年以来的法国经济史》（*Histoire économique de la France depuis 1945*），巴黎1997年版，第29页。

^⑦ [法]《经济与人道主义》，1976年6—10月，第231号，第7页。引自：车耳，《战后法国国家干预经济理论的形成及干预政策的变化》，《西欧研究》，1985年02期，第5页。

五部纲领（1966 - 1970）的时候，政府不得不考虑对经济过热降温，刻意降低经济的目标增速。当时，欧洲经济一体化不断深入，国际竞争更加激烈。法国经济由于工业企业竞争力相对较差，造成了进口速度快于生产增长的速度，形成对外依赖的局面，而且社会就业不充分。经济学家库尔比斯在对法国工业、外贸情况进行分析后，提出“受竞争经济论”（*économie concurrencée*）。该理论认为国家提高有效需求的政策在中期内不能导致受竞争经济（如当时的法国经济）中生产与就业的增长，它只会使对外贸易严重失衡。如果国家不能采取扩大有效需求的政策，那么国家干预应放在促进供给上。因为如果说二元调节理论阐述了宏观经济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那么，受竞争经济理论则是政府在应对国际竞争中应采取的微观具体措施，使得国家宏观经济目标与企业的微观行为协调^⑧。第五部纲领标志着战后法国政府干预微观经济的顶点，它比过去任何一部纲领涉及的微观经济领域都要多。然而，也正因为它涉及面过于宽泛，其针对性和有效性都下降了。

四、法国国家干预经济理论逐步淡出历史舞台（1971 至今）

戴高乐继任者蓬皮杜 1969 年任总统后推出了第六部规划方案（1971 - 1975）。当时法国工业竞争力仍然不强，农村城市化的倾向突出；相应地，方案提出两个重点：一是保增长、调结构；二是中等城市建设。但是 1973 年第一次石油危机宣告法国结束了二战后长达三十年的高速增长。在石油危机的冲击下，法国社会首次开始思考“政府调控市场到什么程度开始失灵”。因为人们认识到，开放的经济增加了不同经济体之间的依存度，国家中期的经济指导计划跟不上形势的变化。1974 年总统德斯坦上台后宣扬一种“多极论”思想，也就是说在政治上要实行多极化，在经济上要实现非集中化。鉴于这个理论，他反

对限制竞争，反对国家干预的扩大，主张限制经济规划的作用。德斯坦认为：市场是保持企业效率的唯一手段；武断地制订计划会导致少数几个人拥有对几百万人做出决定的权力；自由的范围应予扩大，国有的范围应予缩小。德斯坦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对法国计划化形成了一次较大的冲击。但他任职期间还是推出第七部规划方案（1976 - 1980）^⑨，说明国家干预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限制。这是法国国家干预收缩的阶段。继任总统密特朗代表的社会党主张恰恰相反，支持国家实行强有力的干预，将国有化作为经济行动目标。密特朗时代推出的第九部规划方案（1984 - 1988）在经济上突显了法式社会主义。密特朗主政期间国家直接或间接地控制了近 4000 个企业，129 家银行^⑩。然而在政治行动方面又开启了简政放权的进程。向地方分权实质上增加了参与经济决策角色的数量，削弱了国家指导经济的权力。希拉克主政时期，右翼推出一系列新经济政策，其核心是把国营企业重新私有化。在实施完第十部规划方案（1989 - 1992）后，第十一部规划方案没有获得政府通过，法国式的政府调控经济手段遭遇了真正的危机。总之，自上个世纪 70 年代至 1992 年，法国国家干预的强弱随左右派力量的增减而摆动。冷战结束后，世界呈现了另一种经济政治格局，一方面全球化日益加速，另一方面欧盟一体化进程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主权国家的经济掌控权力。中长期的经济规划往往滞后，第八部规划方案在前言中指出：“在新的时代，经济形势变化莫测，经济规划方法已然无效。”法国经济规划方案制定的目标越来越脱离实际发展情势（参见表 1），慢慢丧失了其应用价值。2006 年服务法国经济六十年的计划总署被撤销，原主体变更为“法国战略分析中心”，2013 年再次更名为“战略与展望总署”。

表 1 法国经济规划方案中年经济增长率与实际年经济增长率对比

经济规划方案	年份	年经济增长率预测 (%)	实际年经济增长率 (%)
第二部	1954 - 1957	4.4	5.2
第三部	1958 - 1961	4.9	4.5
第四部	1962 - 1964	5.5	6.3
第五部	1966 - 1970	5.0	5.8

⑧ 参见雷蒙·库尔比斯（Raymond Courbis），《经济发展与外国竞争》（*Développement économique et concurrence étrangère*），*经济学期刊*（*Revue économique*），1969 年第 20 卷第 1 期，第 37 - 83 页。

⑨ 战后第八部经济规划方案（1981 - 1984）并未呈议会，因而没有被实施。

⑩ 靳桂英，《值得注意的法国私有化改革》，*国际金融研究*，1987 年 05 期，第 29 页。

第六部	1971 - 1975	5.9	3.8
第七部	1976 - 1980	5.2	3.8
第八部	1981 - 1984	2.7 - 3.2	1.2
第九部	1984 - 1988	1.6 - 2.2	1.1

数据来源：根据公开资料整理得到。

进入新世纪以来，法国政界学界也在不断探讨法国政府与市场特殊关系模式的历史走向。艾利·科恩等指出，上世纪八十年代法国国有化的失败使得政府认识到，政府无法在宏观、中观和微观经济层面包揽资本的再分配；同时，这一失败促使金融领域全面改革。其实自1983年密特朗时代开始，法国政府对市场进行管理的目的已经转变为“使法国经济更适应欧洲乃至世界市场的需求”。随着新世纪的资本全球化浪潮，法国模式不可避免地在美国模式靠拢^①。正如菲利普·H·戈登与索菲·莫尼耶在《法国新挑战：面向全球化的法国》一书中指出的那样：“虽然法国学界和政届至今很少过度颂扬经济自由化与全球化，然而法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转型一直在静悄悄地进行。”

五、对我国厘清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启示

综上所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上个世纪80年代，法国政府一直奉行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只是干预的深度与广度在各个阶段不同。由于政治、经济和技术等原因，很难用一个固定的标准来划分市场和政府的边界。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不同的治理模式下，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动态的。

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走到深水区的今天，厘清二者关系应注重以下几点：

一是注重中国历史文化传统，探索中国特色的政府与市场关系。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法国国家干预主义思潮的确受到了凯恩斯主义的影响^②。然而二者形成与实践的背景和条件是不同的。如果说凯恩斯理论是一种短期分析，主张就事论事式的短期调节；那么法国干预理论是以中长期分析为基础。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目的要解决经济危机后的萧条问题和严重的失业问题，而法国的政府调控经济旨在重建战后经济，追赶工业现代化，积极参与激烈的国际竞争，同时解决社会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试图达到均等化的目标。具有法兰西特色的法国政府调控经济理论没有生搬硬套

舶来理论，而是充满了哲学与人文思考，既根植法国历史传统，又与现代性结合，从根本上讲是为了解决现代化进程中社会不平等的矛盾。

对中国而言，要善于把中国传统文化和市场经济相统一。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仁爱思想，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就可以发展为以人为本的思想，它体现出经济发展的动力、目的和结果。在中国，鼓吹市场万能的自由主义思潮始终不能占据主流地位，这是因为中国的市场经济始终建立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上，也得益于中国文化的集体主义、爱国主义传统。这些传统有助于政府调控政策得到人民的广泛支持并突破私人资本局部利益的限制，发挥其积极作用。

二是依靠改革顶层设计，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避免落入“全球化模式”的陷阱。法国的经验表明，无论是传统的柯尔贝尔主义，还是现当代的国家干涉主义、经济计划主义，都是为了保证资本主义的社会再生产，希冀依赖国家力量挽救资本主义的种种危机。上个世纪80年代法国早已恢复战后元气，成为先进的工业化强国。那时候，法国社会有关“终结经济计划”的辩论中，人们所谈论的是成熟的市场经济与稳定的政治体制。比较而言，今天我们视野中的“政府”与“市场”，远比他们的议题要艰难。一方面，在三十多年的改革进程中不同的利益集团渐次形成。现在，掣肘改革前行的阻力主要来自于既得利益者的阻碍和反对。这意味着只有通过顶层设计，探索新的改革思路，才能在调整利益关系、解决利益失衡上取得重要进展。非强制性的、灵活民主的制度安排，有助于让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优势。另一方面，我们面临的国际环境更加复杂，资本主义已然全球化，政府对市场宏观调控的难度愈来愈大。在这样的背景下，更有必要强调简政放权不等于放任不管，才能谨慎规避经济全球化的风险。

三是围绕改革开放的根本目的，灵活运用政府调

^① 艾利·科恩，让·皮萨尼—费瑞（Élie Cohen & Jean Pisani - Ferry），《美国与欧洲的经济政策：汇合还是分歧？》（*Economic Policy in the US and the EU: Convergence or Divergence?*），哈佛大学欧美关系会议论文（The Harvard Conference on EU - US relations），2002年4月11日至12日。

^② 皮埃尔·罗萨瓦隆（Pierre Rosavallon），《法国凯恩斯主义思潮史》（*Histoire des idées keynésiennes en France*），法国经济学报（*Revue française d'économie*），1987年第2卷第2-4期，第52页。

控机制与市场机制。法国的国家干预经济行为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都围绕明确的社会发展目标。改革开放的根本目的包括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现代化,让人民富裕起来,振兴伟大的中华民族;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赋予社会主义新的生机活力,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等。那么,围绕这样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如何“更加”尊重市场规律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成为深化改革的关键议题。从法国的经验看,政府制定宏观经济发展方案的时候,注意保持市场和政府干预适度平衡,也就是说,高效的制度安排应紧密结合中国实际,注重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的作用,在更高层次上发挥政府的作用。过度夸大市场功能而漠视政府作用,抑或轻视市场作用而过度依赖政府,都是危险的。经济发展方案并不仅仅是表达改革的愿望,更是创新宏观布局与战略。借用皮埃尔·帕斯卡隆的话说:政府制定的经济发展方案,应犹如路灯和法典,照亮市场前面的方向^③。政府应承担起社会治理责

任,努力弥补市场的缺陷,促进社会和谐,增进百姓福祉,从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引领国家走向繁荣富强。

参考文献:

- [1] 车耳. 战后法国国家干预经济理论的形成及干预政策的变化[J]. 西欧研究, 1985(02): 1-8.
- [2] 车耳. 法国经济计划化的终结[J]. 欧洲研究, 1998(02): 43-51.
- [3] 张丽. 战后法国“政府调控经济论”的主要内容及其成因[J]. 世界历史, 2003(4): 51-57.
- [4] 杨祖功. 法国的国有化[J]. 法国研究, 1984(4): 68-74.
- [5] 王绍西. 关于法国和日本的经济计划[J]. 经济问题探索, 1985(12): 54-58.

(编辑校对: 韦群跃 王晶)

(上接第136页) [6] 沈晓晖. 发展中国家汇率制度选择——基于国际货币体系不对称性的视角[M]. 北京: 中国金融出版社, 2008.

[7] 宋敏, 屈宏斌, 孙增元. 走向全球第三大货币——人民币国际化问题研究[M].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8] 王佳芥, 何莉娟. 货币政策协调和中美合作博弈框架[J]. 中国商贸, 2009, (19).

[9] 吴桂华, 王历. 国际货币制度变迁过程中的利益博弈分析[J]. 江西社会科学, 2009, (11).

[10] 修晶, 张雪峰. 美元会丧失其主导型国际货币地位吗? [J]. 广东金融学院学报, 2009, (5).

[11] 萧松华, 王春月. 现行国际货币体系非均衡: 基于博弈理论的解释[J]. 南方金融, 2005(9).

[12] 曾英姿. 人民币国际化决定因素分析[J]. 财金之窗(5), 2010.

[13] 朱丰根, 朱延福. 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基本特征与问题分析[J]. 西部金融(9), 2012.

[14] Cohen, B. J., *The Future of Money* [M],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4.

[15] Eichengreen, B., Dollar Dilemma - The World's Top Currency Faces Competition [J], *Foreign Affairs*, 88(5), 2009.

[16] Hartmann, P., *Currency Competition and Foreign Exchange Markets: The Dollar, the Yen and the Euro*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17] McCauley, R. N., Capital Flows in East Asia Since the 1997 Crisis [R], *BIS Quarterly Review*, June 2003.

[18] Rubin, R., Remarks on Reform of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Architecture to the School of Advanced International Studies [N], *Treasury News*, April 21, 1999.

(编辑校对: 孙敏 陈崇仁)

^③ 皮埃尔·帕斯卡隆 ((Pierre Pascallon): 《法国经济计划化》(*La Planification de l'économie française*), 巴黎1974年版, 第6页。引自: 张丽, 《战后法国“政府调控经济论”的主要内容及其成因》, 世界历史, 2003年第4期, 第51页。